

羅隱集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羅隱集

雍文華校輯

羅 隱 集

雍文華校輯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2⁵/8 印張·215 千字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4,200 冊

統一書號：10018·537 定價：1.40 元

甲乙集卷第八

詩

徐杭羅

昭諫

夜泊義興戲呈邑宰

溪畔維舟問戴星
北中三害在圓經
長橋可避南山遠
却恐難妨是最靈

曉民

香蓮酒散思朝散
偶向梧桐晤處聞
大底曲中皆有恨
滿樓人自不知君

經來陽令林工部墓

說書

說書者何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語及來京師七年寒餓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爲書紙之曰他人用是以爲榮而子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子用是以困窮苟如是子之書乃自譏耳目曰說書卷軸無多少編次無前後有可以譏者則譏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後有誦予以譁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誑人

說書卷第一

清嘉慶拜經樓叢書本《說書》

前言

羅隱，字昭諫，浙江新城縣（今富陽縣）人。生於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八三三年），死于梁太祖開平三年（公元九〇九年），享年七十七歲，歷文、武、宣、懿、僖、昭、哀七朝，主要活動於宣、懿、僖、昭四朝。

李唐王朝經過安史之亂，元氣大傷，逐漸崩潰，到唐穆宗（公元八二一年即位）開始進入末期。自此之後，藩鎮進一步割據稱雄，互相攻伐，宦官更加飛揚跋扈，完全操有皇帝廢立生殺的大權，朝臣（南衙）和宦官（北司）之間的鬥爭，愈演愈烈；朝臣間的朋黨之爭，紛變迭起；國防空虛，外族不斷入侵；人民慘遭剝削和壓迫，不得不揭竿而起。羅隱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社會腐敗、政治一塌糊塗的時代。

但是，羅隱仍然亟思有所建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執大柄而定是非」（《讒書·重序》），以達到「佐國是而惠殘黎」的目的（袁英《重刻羅昭諫集跋言》）。他自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八五二年）到唐僖宗光啟三年（公元八八七年），十次參加進士考試，均爲「有司用公道落去」（《讒書·重序》）。他行卷投書，浪跡天下，足跡遍及陝西、四川、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和浙江。然而，他這些努力終歸失敗。因自中唐以後，科場競爭愈演愈烈，以致後來完全爲權豪把持，士子及第，或特門第高貴，或以朋黨相干，或賴顯宦提携，或靠親朋援引，甚至趨謁權門，賄賂請托，賣身投靠，無所不用其極。致使一般

寒士投效無門、仕路斷絕。羅隱也就道路坎坷，窮愁失意，「十上不中第」，不得不以五十五歲垂暮之年，東歸吳越，投靠錢鏐。這樣，就使得羅隱對唐末社會的腐敗、黑暗不能不有較為深刻的體驗和認識，使他不得不退而「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戒將來」（《讀書重序》），對社會現實採取揭露和批判的態度。

一

爲人才的進退用舍而抗爭，是羅隱詩文創作的一貫主題。羅隱詩歌中有大量自傷懷抱、感歎不遇之作。他在詩中訴說自己怎樣把希望寄託在皇帝身上，背井離鄉，到長安應試，結果因朝中没有親貴，只落得「一枝仙桂有風霜」——年復一年，總是不第（《長安秋夜》）。他把權豪子弟比作蘭蓀，飽受春風催放、春雨滋潤，把自己比作凋零殆盡的秋菊，幾經嚴霜摧折，偶得幸存下來，忍着痛苦，有意遲生，而不敢與蘭蓀爭春（《登高詠菊盡》）。他對別人的倚勢騰達，投以輕蔑（《春風》）；對自己沈諸下位而憤憤不平（《病驄馬》）。他經過王昌齡被貶謫的地方，便發出了「漫把文章矜後代，可知榮貴是他人」（《過廢江寧縣》）的歎息；他想到燕昭王築黃金臺，招攬人材，便喊出了「浮世近來輕駿骨，高臺何處有黃金」（《燕昭王墓》）的憤激之聲。他既對自己「塵埃鞏洛虛光景，詩酒江湖漫姓名」（《途中寄懷》）的遭遇深懷悲感；也爲他人「太平匡濟術，流落在人間」（《題玄同先生草堂》）的命運而深感不平。羅隱的雜文更是蘊藉着一股十分強烈的憤懣不平之氣。他說自己「少而羈窘，自出山二十年，所向推沮，未嘗有一得幸於人」（《答賀蘭友書》）；又說自己在「風俗佞斂，居位者以先後禮絕，競進者以毀譽相高，故吐一氣，出一詞，必與人爲行止」的環境

裏，「不惟性靈不通轉，抑亦進退間多不合時態，故開卷則悒悒自負，出門則不知所之，斯亦天地間不可人也」(《投知書》)。天高地厚，簡直無處可以容身！

羅隱認識到，個人的進退用舍、成敗榮辱，有着深刻的社會原因。他的不遇，是因為他出身寒賤，一個「江左孤根」(《投鄭尚書啟》)、「族惟卑賤」(《投湖南王大夫啟》)的士子，要在唐末官場中爭一席位，當然要碰得頭破血流；他的不遇，是因為科舉制度腐敗已極，使他感到「難將白髮期公道」(《東歸》)；他的不遇，是因為李唐王朝統治者最後自身難保，根本顧不得選拔人材，所以他大夢初醒似地說：「天子未能崇典誥，諸生徒欲戀旌旗。」(《寄三衢孫員外》)總之，他的不遇，是他所處時代造成的。他在《紱二狂生》中就認為，阮二人之所以生不逢時，英雄無主，乃是「人難事也」，「時難事也」，是當時漢衰晉弊的時勢使然。

事實上，羅隱的坎坷遭遇，在當時帶有普遍性。他在《投知書》一文中指責當時「執大柄」者不能為國家羅致人材時說：

而執事者，提健筆為國家朱線，朝夕論思外，得相如者幾人？得王褒者幾人？得之而用之者又幾？夫昔之招賢養士，不惟吊窮悴而傷凍餒，亦將詢稼穡而問安危。

因此，羅隱的那些自傷懷抱、感歎不遇的詩篇，所抒發的就不僅僅是「卒不離乎一身」(《桐江詩話》)的個人情緒；他在《諷書》中所吐露的那些憤悶不平之言，也絕不僅僅是他自己「不遇于當世」的「泄怒」之作(《方回諷書跋》)，而是通過個人遭遇的吐訴，表達了當時大多數有抱負、有理想的知識分子的心聲，傾吐了

他們的痛苦和不幸，並通過那些牢落感慨的憤悶不平之言，對當時社會上人才進退用舍的不合理現象，以及造成這種不合理現象的社會現實，進行了批判和抗爭。

二

羅隱的詩文對當時的黑暗社會作了廣泛的揭露和批判。

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是當時社會上對人民危害最深最大的兩股黑暗勢力。羅隱的批判矛頭，首先指向了他們。伊尹、周公自古以來被尊爲聖人，但羅隱却見前人所未見，發前人所未發。在《伊尹有言》中，他認爲伊尹立、放太甲，「臣下有權」，是不合法的。在《三叔碑》中，他懷疑周公有謀篡野心，只是迫於輿論，才轉而輔佐成王，成了「聖人」。羅隱否定伊尹擅權立、放太甲，懷疑周公有謀篡野心，實質上也就是對宦官專權、廢立生殺皇帝，藩鎮反抗中央，妄圖「取而代之」的陰謀的揭露和批判。可以看出，這些議論並非無的放矢，顯然是針對唐末「君若客旅，臣若豹虎」（《敘二狂生》）的社會現實而發的。

唐末吏治大壞，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官僚士大夫驕奢淫逸，貪婪成性。唐代由進士出身的官僚士大夫，有相當多的人都曾久困名場，歷盡坎坷，一旦顯達，便拚命享受。針對這種情況，羅隱在《秦中富人》、《貴游》、《錢》、《金錢花》、《塞外》等詩中，對官僚貴族的奢侈和貪婪，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特別是《越婦言》，借古諷今，對那些未通達之前，將「匡國致君」、「安民濟物」叫得震天價響，而在通達之後，由於「急于富貴」，便把國計民生忘得一乾二淨的官僚士大夫進行了無情的鞭撻。

唐末的社會風氣也十分腐敗，羅隱在詩文中對此進行了有力的針砭。羅隱十分痛恨趨謁權門、鑽營拍馬的宵小之徒。他在《候子》一詩中寫道：「終日路岐旁，前程亦可量；未能慚面黑，只是恨頭方。」這完全是借自嘲而抒憤懣。羅隱對於「以祿位相尚」，甚至只認金錢權勢、不認骨肉情親的腐敗風氣也極端痛恨。所以，他在《刻嚴陵釣臺》一文中，借漢光武做了皇帝之後仍然不忘故舊的事，贊揚了「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的不以富貴窮達論交情的精神，並以此針砭當時的世道人心說：

今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尚，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而骨肉親戚已有等差矣，況故人乎？盡管當時政治十分黑暗，社會風氣極端敗壞，但却很少有人出來批判、抗爭。對此，羅隱作了《題神羊圖》以表達這方面的憤激。

三

羅隱雖然處境坎坷，但並沒有沉溺在自傷懷抱、感歎不遇的悲哀中，從他的詩文裏，我們能夠聽到為民生疾苦的呼喊。

唐末戰禍頻仍。「乾坤墊裂三分在，井邑摧殘一半空。」（《江亭別裴總》）「生靈寇盜盡，方鎮改更貧。夢裏舊行處，眼前新貴人。」（《亂後逢友人》）寫出了當時國家殘破、人民塗炭的社會現實。而《卽事中元甲子》、《秋江》、《送王使君赴蘇臺》等詩寫戰禍之慘，尤為真切。總之，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和痛苦，老百姓所受的屠戮和折磨，在羅隱的筆下有時表現得十分深刻和沉重。

對於統治階級的橫征暴斂，羅隱也敢于進行正面指責。鑒于錢鏐強使西湖漁人每天繳納鮮魚數

斤，名曰「使宅魚」，苛酷盤剝勞苦百姓，他寫下了有名的諷刺詩《題磻溪垂釣圖》，致使錢鏐不得不馬上停止征收這種漁稅。

在人民飽經戰亂、處于饑寒交迫的情況下，羅隱希望官吏能够愛惜老百姓，關心老百姓的疾苦。朋友走馬上任，他就勸告說，經過戰爭破壞，國家殘破了，非常需要清明正直的官吏來治理，因此不要放慮到邊遠地區任職條件太差，而首先應該放慮老百姓眼前的生計問題（《送漢州使君》）。他把愛惜老百姓視為評判官吏好壞的一個標準（《送前南昌崔令替任映攝新城縣》）。處在那個政治黑暗、吏治腐敗的時代，他經常發出「惟恐亂來良吏少」（《走遠糧》）那樣充滿深切憂慮的呼聲。

羅隱的詩文還接觸到統治階級對勞苦百姓的壓迫和剝削所造成的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盡道豐年雪，豐年事若何？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雪》）眼光是銳利的。尤其是《蜂》：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數風光盡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對社會上勞者饑不得食，寒不得衣，而不勞者却可以肆無忌憚地鯨吞別人的勞動成果的不合理現象，進行了譏諷，發出了不平之鳴。

四

對最高封建統治者進行嘲諷和批判，是羅隱詩文中最引人注目注目的篇章。

羅隱寫了很多咏史詩，諷刺前代的荒淫誤國之君，實際上是諷刺現實。特別是當我們讀到他咏楊妃的幾首詩時，更能感覺到這些咏史詩的現實批判性。安史之亂是李唐王朝由鼎盛時期走向衰落的

轉折點。後世的詩人、論客，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大多把一腔怨憤發泄在楊妃身上，有意或無意地爲最高統治者開脫罪責。但是，羅隱的《華清池》、《馬嵬坡》等詩的針對性却大不相同。他的矛頭直指最高統治者明皇，認爲罪責應該由明皇來負。羅隱的這種見識，在當時確有高人一籌之處。

羅隱還寫了不少史論，從歷史事件中，總結出許多興亡治亂的經驗來。《漢武山呼》指出漢武帝聽信前後左右的阿諛奉承，窮極游觀，結果弄得「勞師弊俗」、「百姓困窮」。《迷樓賦》指出隋煬帝大權旁落，細人用事，不迷于樓而迷于人，因而導致滅亡。《吳宮遺事》寫吳王夫差不聽忠諫，喜納阿諛，重用奸邪，不顧百姓，終于國破身亡。這些都說明羅隱對於興亡治亂，是頗有見識的。而促使他去探求歷代興亡治亂的奧妙的原因，就是當時統治階級從上到下，奢侈荒淫，醉生夢死的社會現實。

對於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羅隱也敢于表明自己的批判態度。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僖宗倉惶出逃，沿着玄宗走過的老路，再次逃到四川成都。而且就在國家殘破、民不聊生，一乘輿播遷、流離道路的時候，唐僖宗還因爲喜愛一隻馴善的、能跟朝臣們一起上班的猴子，而賜給玩猴伎人一件五品緋袍。對此，羅隱寫出了《帝幸蜀》、《感弄猴人賜朱絨》這樣充滿尖銳嘲諷和強烈憤懣的詩篇。

羅隱對最高封建統治者的揭露和批判，並沒有停留在他們的奢侈浪費、荒淫誤國上，而是觸及到了（當然是不自覺的）他們的階級本質。自古以來，封建帝王都打着「安天下」、「救黎庶」的旗號，來取得自己的統治。羅隱的《英雄之言》一文，說劉邦、項羽這類「英雄」，由于「退遜之心、正廉之節，不常其

性」，因而看到秦皇宮殿「靡曼驕崇」，秦始皇「峻宇逸遊」，便產生了「居宜如是」、「可取而代」的思想，却又打着「救彼塗炭」的堂皇旗號。而「退遜之心、正廉之節，不常其性」，正是「盜」異于常人之處，這即是說，西劉、楚籍非英雄也，盜而已矣！羅隱在這裏借題發揮，把矯言飾性的最高封建統治者打着拯救民衆的旗號，實際上則干着營私自肥勾當的卑劣心理和強盜本質，無情地揭露出來。

還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羅隱在揭露最高封建統治者荒淫誤國的罪行及其強盜本質的同時，似乎開始探索時局的解決辦法，尋求變革現實社會的途徑。他在《辨害》一文裏就指出「順大道而行」，就不能「盡規矩而進」；「救天下」就不能「全禮義」。對於當時時局的解決辦法，已經不是「叩馬而諫」，而是非「佐盟津之師」不可了，也就是說，需要弔民伐罪，來一次大的變革。羅隱的這一思想，結合隨後爆發的黃巢大起義來看，是很值得注意的。

五

羅隱的詩文創作，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性質。詩到晚唐，流派衆多，風格各異，流風一直延及唐末。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對詩文有不同的運用（有的將它作爲改造社會人生的武器，有的則只當作謀取科第仕進的敲門磚），以及繼承不同流派的風格，從不同的角度謀求藝術創新之外，主要原因，是詩人們在政治局勢紛亂，階級鬭爭激烈的唐末社會現實面前，態度很不一致，因而表現出來的創作傾向，也就各不相同。有的粉飾太平，歌吟虛幻；有的躲到社會的一角，冷僻空寂，尋幽訪隱，而于社會動亂，則不置一詞；有的流連風景，優遊歲月，全不把國計民生放在心上；有的雖然也偶爾感念時事，心

存天下，但終于棲隱林泉，全身亂世；有的雖然也有傷時憂國之心，起救蒼生之意，而終于沉緬于綺羅香澤之中，寫盡閨閣艷情；有的則承長吉餘緒，搜奇獵異，慘淡經營，極力創造幽奇詭秘的意境。此外，還有的詩人專力創作咏史詩，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作品都是有所爲而發，意在以歷代興亡，來抒發對當時現實的感慨。但是，上述種種流派都不能，即使能，也不够大膽地直面人生，寫出民生疾苦，爲改革現實社會而抗爭、呼喊。能够這樣作的是皮日休、羅隱、杜荀鶴、聶夷中、曹鄴、陸龜蒙、于濬、司馬扎、劉駕、邵謁等現實主義流派詩人。《一瓢詩話》在論到羅隱時說：

羅昭諫爲三羅之傑，調高韻響，絕非晚唐瑣屑，當與韋端己同日而語。

他是多少看出了羅隱的詩文不同于一般唐末詩人的作品的這一特點的。當然，在現實主義詩歌流派中，羅隱又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他很少象皮日休、杜荀鶴那樣把勞動人民的生活作爲直接的、具體的描寫對象。他的詩所寫的不是具體的、直接的社會生活事件，而主要是那個時代的矛盾衝突，思想情緒。這是抒情詩反映社會現實的基本形式，在研究、評價抒情詩時，這一點是不能忽視的。

羅隱詩文的諷刺藝術是相當突出的。《舊五代史》羅隱本傳說他的詩「多所譏諷」。《唐才子傳》說他「詩文幾以譏刺爲主，雖荒祠木偶，莫能免者」。由此可知，羅隱的詩文多所譏諷，前人的評價是一致的。他善于借助歷史題材，諷刺現實。他的「史論」，思想犀利。他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深刻觀察和分析，敏銳地抓住事物的本質，所以能够超越前人，有所創見。而且文章中心突出，文字簡約，筆鋒凌厲，具有投槍、匕首的戰鬥作用。同時，作者能够根據現實鬥爭的需要，採掘史料，以史論政，使他的「史

論「帶有明顯的「政論」性質。他的咏史詩，能够「別行一路」，見出新意，大多能從「新」的角度，作翻案文字，能够做到「案」，翻得有理「新」，有高人一籌的見識。這就使得他的咏史詩，思想豐富，諷刺深刻。而且主旨常常以議論出之，更增強了批判現實的戰鬥性。

用寓言和故事刻畫形象，說明道理，也是羅隱常用的手法之一。《說天雞》寥寥數筆，勾勒出了「天雞」行屍走肉、徒有其表的醜惡形象，借以諷刺那些徒然以貌驕人，其實百無一能的官僚士大夫，的確收到了形象生動、言簡意賅的藝術效果。《越婦言》將一個嫌貧愛富的歷史故事，信手拈來，稍加捏合，然後借題發揮，即便構成了一篇嘲諷官僚士大夫的絕妙文章。這些都說明羅隱是一名善于採用寓言和故事以表達主題的高手。

羅隱的諷刺詩文之所以寫得深刻動人，富有思想性、富有強大的諷刺藝術力量，是與他對社會現實生活的深刻認識分不開的。羅隱能够于個人成敗、家國興亡之中，看出一定的社會政治原因，他把它稱之為「時」。這當然不是唯心主義的「命運」，而是指的一種社會發展的客觀形勢。雖然他不可能象我們今天這樣清楚地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但這種客觀形勢不以人的願望為轉移，他是隱隱約約感覺到了的。這在《敘二狂生》、《西施》、《籌筆驛》等詩文中都表現得相當明確。

當然，羅隱的詩文創作在思想上和藝術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這是應該予以剔除的。羅隱雖然對唐末社會現實和最高統治者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是，當強大的農民起義要推翻李唐王朝時，他却又流露出對它的留戀和行將滅亡的悲哀，從而在詩文中表現了對農民起義的某種敵視態度。這種

思想情緒集中地表現在《中元甲子以辛丑駕幸蜀四首》和《與招討宋將軍書》裏。這正是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在他身上打下的深深烙印。羅隱畢竟是地主統治階級的內部成員，特別是從整個意識形態上來講是這樣。他世界觀中的進步因素，並沒有改變他的整個的地主階級的階級意識和階級立場。

由於道路坎坷，仕途失意，羅隱有時也流露消極出世的思想。他在《自貽》和《水邊偶題》等詩中，把秦皇漢武的事業功名，個人的窮達榮辱視爲過眼煙雲，表現出心灰意冷、厭棄人間的思想情緒。

羅隱的詩文在藝術上，也有粗疏浮泛之處。有不少詩歌，脫口而出，格調不高，缺乏意境創造，《漫天嶺》、《白角箆》、《自遣》便都屬於這一類。而《廣陵妖亂志》則近乎荒誕，並非嚴肅之作。

儘管羅隱詩文在思想上、藝術上都有缺陷，但絕不能以偏概全，將他一筆抹煞，如《石洲詩話》說他「極負詩名，而一望荒蕪，實無足采」，顯然是不公平的。前人對羅隱評價比較公允的，應數明人胡震亨。他在《唐音癸籤》卷八中說：

羅昭諫酣情飽墨，出之幾不可了，未少佳篇，奈爲浮渲所掩。然論筆材，自在僞國諸吟流上。我們今天來看羅隱的詩文，應該說，它是比較廣泛地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的，特別是諷刺詩和諷刺雜文，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在我國文學史上呈現出獨特的風貌。

《羅隱集》的整理校輯，得到了吳世昌先生、喬象鍾先生和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同志們的指導與幫助，謹致以衷心的謝意。

雍文華 一九八二年六月

校輯說明

一、羅隱著作，諸籍所載不一。今存甲乙集十卷並補遺一卷（全唐詩編爲十一卷）、諷書五卷、廣陵妖亂志一卷、兩同書十篇、序二篇、記四篇、啓十九篇、論一篇、碑一篇、表一篇、銘一篇、狀一篇、列傳四篇。而吳越掌記集（今僅存代武肅王錢鏐謝賜鐵券表一篇）、湘南應用集（今僅存自序一篇）、後集（直齋書錄解題所云律賦，今不存；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云：其餘第十一卷之文、疏、序、書、論、碑、銘、狀、紀事，第十二卷之啓，第十三卷之雜著，第十四卷之兩同書，當即後集與湘南集之文耳。則皆散佚混亂，名存實亡。其餘所謂羅隱賦、羅隱啓事、外集詩似爲文、賦、詩、啓之別本（亦多散佚）。譏本似爲譏書之異名。至于淮海寓言則早已亡佚。宋史·藝文志所載汝江集爲諸籍所不載，今已失傳，真偽亦不復可攷。

二、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遂初堂書目所載羅隱集、羅昭諫集均早已亡佚。明萬曆中姚士舜（叔祥）重輯屠中孚校刊的羅昭諫江東集五卷本雖存，却並非全璧。現存比較完整、常見的羅昭諫集八卷，乃清康熙九年（公元一六七〇年）新城（四庫全書提要誤作彭城）令張瓊瑞榴堂據江東集抄本（即姚輯屠校五卷本）和甲乙集刻本合刻（簡稱張本），亦非舊帙，遺漏頗多。其中，詩漏收三十七首，文漏收五十二篇。四庫全書著錄者即此本。此外，還有一個十四卷附補遺的舊鈔本，見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帙雖多，似未出張本範圍。道光甲申（一八二四年）吳塘又就張本增補一